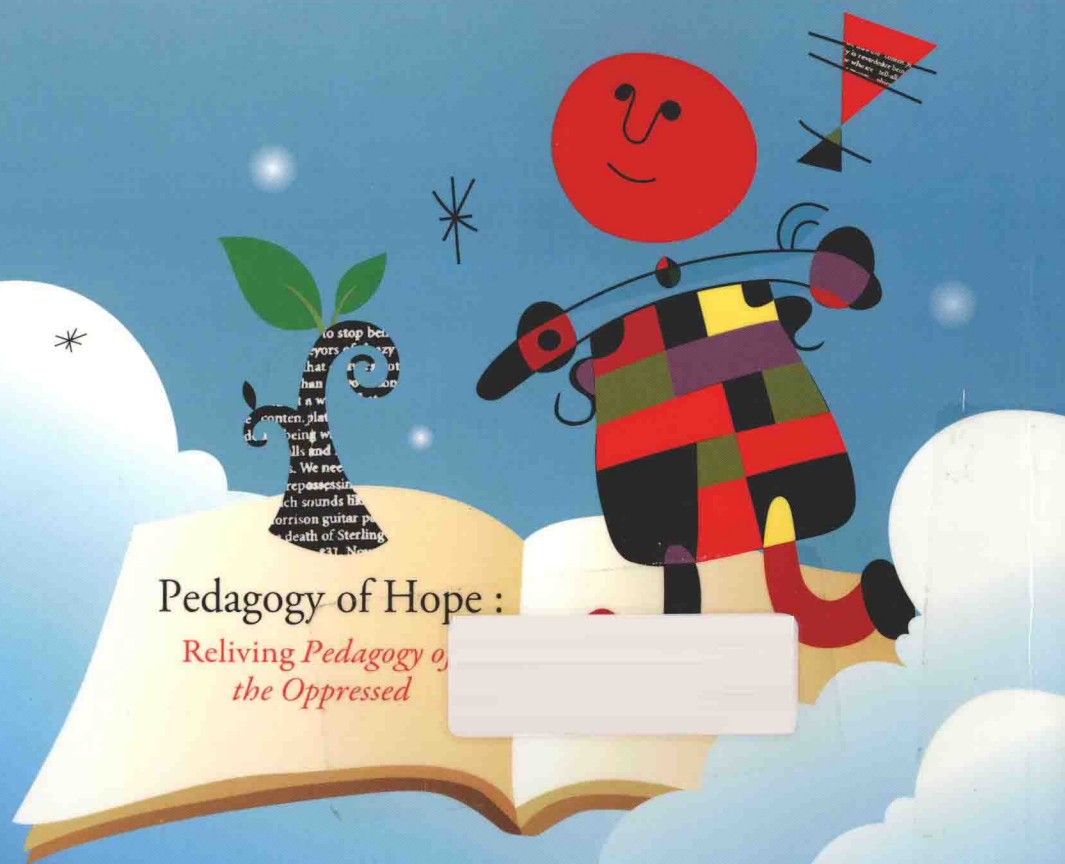


希望教育學

重現《受壓迫者教育學》

保羅·弗雷勒 (Paulo Freire) ◎著

國立編譯館 ◎主譯 方永泉、洪雯柔、楊洲松 ◎譯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Pedagogy of Hope :

*Reliving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希望教育學 重現《受壓迫者教育學》

保羅·弗雷勒以《受壓迫者教育學》建立起他在教育史中的地位。

從《受壓迫者教育學》出版以來，備受期待的《希望教育學》代表了一個歷史與綜合體，表現拉丁美洲與第三世界持續不斷的社會鬥爭。

在本書中，弗雷勒再次探索了他最為人所熟知的分析主題，

在弗雷勒的所有著作中，總是將批判的嚴肅性、

人文客觀性及有約束的主觀性結合成一種開創性的創新，

透過本書我們可以更加理解弗雷勒的教育思想。

《希望教育學》見證了那些數以百萬計並不富裕、且經常沉默，

但不願讓希望熄滅的世代之內在生命力，

這些人遍及全球，他們因解放教育學及弗雷勒的所有作品而被賦權增能。

ISBN 978-957-732-400-9



9 789577 324009

00360

統一編號 (GPN)

1010000507

CAM0014

希望教育學

重現《受壓迫者教育學》

Pedagogy of Hope

Reliving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著

國立編譯館 主譯

方永泉、洪雯柔、楊洲松 譯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2011 年 3 月

Copyright © 1992 by Paulo Freire

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4 by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ulo Freire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1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希望教育學：重現《受壓迫者教育學》/ 保羅·弗雷勒
(Paulo Freire) 著；國立編譯館主譯；方永泉，洪雯
柔，楊洲松譯。-- 初版。-- 臺北市：巨流，2011.3
面；公分
譯自：Pedagogy of hope: reliving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ISBN 978-957-732-400-9 (平裝)

1. 教育哲學

520.11

100002981

希望教育學——重現《受壓迫者教育學》

原著：Pedagogy of Hope: Reliving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原著者：保羅·弗雷勒 (Paulo Freire)

主譯：國立編譯館

譯者：方永泉、洪雯柔、楊洲松

出版者：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57 號 2 樓之 2

電話：(07) 2265267 傳真：(07) 2264697

發行人：楊曉華

總編輯：蔡國彬

責任編輯：黃麗珍

封面設計：楊芳菁

編輯部：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集英樓 2 樓

電話：(02) 86613898 傳真：(02) 86615465

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chuliu@msl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法律顧問：林廷隆律師 電話：(02) 29658212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978-957-732-400-9

GPN：1010000507

2011 年 3 月初版一刷

定價 360 元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http://www.nict.gov.tw

地址：10644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79 號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

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委員會

電話：(02) 33225558

展售處：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台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02) 25180207 (代表號)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台中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台中市區中山路 6 號

電話：(04) 22260330 傳真：(04) 22258234

開場白

我們周遭正充斥著一種實用主義的論述（pragmatic discourse），告訴我們要去適應現實。夢想和烏托邦，它們不僅被認為無用，甚至完全是阻礙。（然而，夢想與烏托邦畢竟還是教育實踐的一部分，它們具有揭露宰制階級謊言的力量）。在這樣的情形下，我竟然會寫這本名為《希望教育學——重現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Hope: Reliving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書，似乎有些不可思議。

但是相反地，對我來說，進步的教育實踐可說永遠都在進行揭露真相的冒險，它永遠是一種顯現真理的實驗。也正因為我一向如是思考，總是有一些人不斷地爭論我到底是不是一名教育工作者（educator）。最近，我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巴黎所舉辦的一個會議——那裡有一個人告訴我，一些拉丁美洲的代表拒絕承認我具有教育工作者的身分；至少就他們的角度來看，我不算一名教育工作者，而且他們還批評我，對他們而言，我似乎過度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但這些人沒有察覺到的是，當他們拒絕承認我的教育工作者身分，並且說我「太過政治化」的同時，他們也和我一樣地政治化。當然，因為他們和我站在相對的立場，所以他們其實並不「中立」，而且也永遠不可能達到「中立」。

另外，一定還有許多人，他們對我的看法和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大學教授）一樣。這位朋友他來找我，訝異著問：「但保羅……一部**希望教育學**，在像今日的巴西那樣貪腐的地方？」

事實上，那些無恥與腐化的情形正以「民主化」之名，依舊掌握我們這個國家的高層權力，他們忽視公眾的利益、豁免犯罪，儘管這個國家開始挺身抗議，這樣的問題卻仍日益擴大而且加深。即使是年輕人或十來歲的青少年，都群集街頭，進行批判，要求當權者誠實與坦率。民眾大聲抗議那些證據確鑿的公務貪污，大眾廣場上又再一次擠滿了人潮，或許有些生澀，但是我們在街角上又看見了希望，一種存在於我們之中每個人的希望。彷彿在目睹這麼多無恥之事時，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都感到一種不可抑制的嘔吐感。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我當然不會忽略那種具體存在的絕望感（hopelessness），更不會無視形成絕望感的各種歷史、經濟及社會成因——除卻希望與夢想外，我無法理解人類存在的本質以及為追求提升人類本質所進行的奮鬥。希望是一種存有學的需求（ontological need），絕望則僅是一種已經喪失其意義的希望，變成對此存有學需求的扭曲。

當絕望變成一種習以為常的準則（program）時，它就會麻痺我們，讓我們動彈不得，我們

會屈服於命運。由於我們的確需要會改造這個世界的激烈抗爭，屈服於命運也將會使我們無法集中力量。

我本人是充滿希望的，這並非出自我個性中的固執，而是來自一種實存的具體使命。

我的意思並不是因為我自己充滿希望，就把自己的希望視為足以改變整個現實的力量，所以才開始抗爭而不考慮具體及物質的條件，並高喊：「單靠我的希望便已足夠！」不，我的希望是必要的，但是單憑希望還不夠。單有希望，並不能獲勝，但沒有了希望，奮鬥將脆弱而不穩。我們需要一種必要／不可或缺的希望（critical hope），就像魚需要純淨的水一樣。

以為單憑希望即可改造這個世界、行動只需抱著天真的希望，這樣的觀念特別容易導致絕望、悲觀與宿命論。但在改造世界的抗爭中，若不抱著希望，以為抗爭可以被化約為僅是一種算計的行為，或是純粹的科學方法，這只是一種廉價的幻覺。希望是基於對真理的需求，它是整個鬥爭過程中的道德性質，所以沒有了希望，就等於否定了抗爭的中心思想。最要緊的是，如我之後會再提到的：希望，是一種存有學的需求，它必須停留在實踐中。作為一種存有學的需求，希望也需要實踐，以使其成為歷史中的具體存有學。這也就是為什麼沒有一種希望是存在於純粹抱以希望之中。單單只有最原始的希望，並不能使我們達到希望的對象；若只是希望，就是徒勞無功的希望。

惟若沒有最低限度的一絲希望，我們甚至不能展開鬥爭；但若沒有鬥爭的過程，作為一種本

體論需求的希望終會煙消雲散、喪失意義，甚至轉為毫無希望，而毫無希望可能形成悲慘的絕望（despair）。因此，我們需要一種針對希望的教育。當「希望」發生之時，對於我們的存在來說，它是如此的重要，不論是在個人、還是在社會的層面，也因此我們必須小心不要以錯誤的方式體驗希望，甚至使希望淪為毫無希望及絕望。毫無希望與絕望是無所作爲（inaction）與停滯不前（immobilism）的結果，同時也是成因。

在有限的處境裡，就在所謂的「未經檢證的可行性」（untested feasibility）之外——有時是可被察覺的，有時則否——我們可以發現到為何會有兩種不同的立場：一是充滿希望的立場，另一則是毫無希望的立場。

作為進步主義教育工作者的任務之一，就在於透過一種嚴謹、正確的政治分析，不論前面橫亙著怎樣的險阻，仍要揭示心存希望的機會。畢竟，若無希望，則吾人所能為者甚微，即便要去奮鬥，也是困難重重。而當我們無望地及絕望地進行鬥爭時，我們的鬥爭其實無異於自殺，因為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可能會抓狂、會放下自己的武器，將自己投身於純粹只為發洩怨恨的徒手打鬥中。當然，懲罰、處分及矯正——這些當我們在希望中發動鬥爭的責罰性因素，並且堅信其具有道德及歷史正確性——是屬於政治過程的教育本質，而鬥爭則是政治過程的表達方式。如果那些不義、弊病、欺詐、不法利益、圖利自己或是權位的運用，這些種種為了自己的私利所做的壞事——這些都是我們現在之所以在巴西展開鬥爭的原因，它們證明了我們的憤怒是正當的——

竟然沒有受到任何的制裁與矯治，那就是不公平的。正如那些為惡之人，在法律之下被判定為有罪但卻未受到任何制裁，這種情形也是不公平的一樣。

若我們單單認為上述的情形僅發生在第三世界，就如我們所常聽到，以為它只是第三世界中特有的情形，這其實並非正確的說法。第一世界中向來也都有各式各樣的醜聞、邪惡與剝削。我們只消想到殖民主義（colonialism），想到他們對被侵略者、被征服者及被殖民者所進行的屠殺；想到二十世紀所發動的戰爭，那些無恥的、低級的種族歧視，以及各種因殖民主義所造成的劫掠等。不，並不是只有第三世界才會發生那些不光彩的情形。但我們再也不能縱容這些曾在我們心靈最深處深深傷害過我們的醜事。

就從手邊成打的例子中找一個來說明，有些政客企圖對其選民隱瞞其所作所為（而事實上選民絕對有權知道國會到底在做些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這樣做），這些政客在對總統的信任投票中，竟然道貌岸然地辯稱，以民主之名，他們該享有「祕密投票」的匿名權利。此等作為是何等的諷刺！為什麼要躲起來祕密投票，難道公開的方式會對他們造成人身安全上的危險？為什麼他們躲躲掩掩，竟還敢大言不慚地名之為要維護總統「不受污蔑」、「尊榮」及「不被攻訐」？我們就讓這些政客有尊嚴地去為自己的選擇負起該負的責任吧！就讓他們站出來，為那些站不住腳的觀點進行自我辯護。

《希望教育學》正是這樣的一本書，它帶著某種憤怒與愛而寫成，沒有這些，就沒有希望。

這本書的用意在提供一種對於寬容（但不要與縱容相混淆）及基進的辯護；它也是一種對於宗派主義（sectarianism）的批判。本書嘗試解釋進步現代性（progressive postmodernity）並為其進行辯護，也拒斥保守的新自由主義後現代性（neoliberal postmodernity）。

在本書中，我首先要做的是對於《受壓迫者教育學》的幼年期、青春期及成熟期等各時期思想發展及其結構、理路、要素等進行分析說明。可以說在本書中我「重訪」了《受壓迫者教育學》，我先以口頭的方式宣揚了其中的一些主張，然後再用書寫的方式將其紀錄下來。

固然《受壓迫者教育學》中的某些要素及思路，隨著我的流亡而結束，但在流亡的途中，我的心靈沈浸於歷史中——文化的記號、各種記憶、情感與愁緒、懷疑、夢想，這些從未付諸實行，然而我從沒放棄——並渴望著我的世界、我的天空，乃至於大西洋溫暖的水流；我渴望聽到不管是「不適當的（improper）還是正確的（correct）的民眾語言」。在流亡的過程中，我的靈魂所承載的記憶，其中交織著太多的頭緒；此時，更多新的事實與知識又深深地影響我，伴隨著新的經驗，共同交織成一片五顏六色的織錦。

《受壓迫者教育學》就是這樣出現的。在本書中，我將談到當我在寫作那本書時，我是如何進行學習；且更進一步地談到，在我第一次對於此教育學所進行的演講中，我即在其中學習到如

何寫作那本書。

接著，本書的第二階段，我會再回到《受壓迫者教育學》，我會討論其中的某些場景，以及分析一九七〇年代時對於該書的某些批評。

在本書的第三及最後的一個階段，我會再詳細地談到該書的基本理路及結構，其實就是**受壓迫者教育學**本身。在這個部分，我會實際地再次體驗（徹底、重現）我在世界各個角落旅行時的一些重要時刻，而且事實上，這些時刻也一直鮮活地存在著，我也會針對這些時刻重新思索。無論我到世界的哪個角落，都受到《受壓迫者教育學》的影響。我覺得，或許我應該將自己重新帶回《受壓迫者教育學》，並且再次談到我在一九七〇年代所體驗到的種種，讓讀者能夠更清楚我的想法。我與《受壓迫者教育學》之間的重逢，並非要將自己淹沒於懷舊之中，是爲了說明這本書中所提及的並非只是往事，而是現在的事實。

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我所分享的事實、辯證、討論、計畫、實驗以及對話，都對《受壓迫者教育學》產生了影響。對我來說，不論是在一九八〇年代或是現在，它們也依然鮮活地存在。

在這篇開場白中，我想要感謝一群在巴西及海外的朋友們。在我開始著手《希望教育學》之前，他們就和我一起工作了。我與他們之間有許多對話，從他們那裡我獲得了非常重要的鼓勵，

* Manuel Bandeira, "Evocação do Recife," in *Poesias*, 6th ed. (Rio de Janeiro: José Olympio, 1955), p. 191.

這些人包括：Ana Maria Freire, Madalena Freire Weffort, Maria de Fátima Freire Dowbor, Lutgardes Freire, Ladislau Dowbor, Celso Beisiegel, Ana Maria Saul, Moacir Gadotti, Antonio Chizzotti, Adriano Nogueira, Márcio Campos, Carlos Arguelo, Eduardo Sebastiani Ferreira, Adão J. Cardoso, Henry Giroux, Donald Macedo, Peter Park, Peter McLaren, Ira Shor, Stanley Aronowitz, Raúl Magaña, João Batista F. Pinto, Michael Apple, Madeleine Groumet, Martin Carnoy, Carlo Torres, Eduardo Hasche, Alma Flor Ada, Joaquim Freire, Susanne Mebes, Cristina Freire Heiniger, 和 Alberto Heiniger 等人。

我想特別向我的妻子，安娜（Ana Maria Freire），表示感謝，她為我的書做了很棒的註解，並釐清書中的重點。其中上標數字的註解皆置於書後，星狀標註則是置於各頁下方。

我也想對 Suzie Hartmann Lonta 表達謝意，因為她耐心地、投入地校對了我的文稿。

我不能忽略對 Werner Mark Linz 的感謝，他總是面對面或者以通信方式熱心地與我討論此計畫；比起二十四年前他閱讀《受壓迫者教育學》的手稿並將之出版時，其熱忱絲毫未減。

最後，對於 Marcus Gasparian，他是巴西現今最優秀與敏銳的出版商之一，他展現興趣，時常與我討論，進而形成本書，我要對他獻上一個親切的擁抱以及一句「由衷感激您」。

保羅·弗雷勒

於聖保羅 一九九四年一月

目次

開場白	1
第一章	47
第二章	87
第三章	115
第四章	155
第五章	179
第六章	215
第七章	241
後記	245
註	

第一章

一九四七年，我在母校奧斯瓦多·克魯茲寄宿學校（Colégio Oswaldo Cruz）²教授葡萄牙語。我在這所學校完成中等教育，並在該校校長艾瑞茲歐（Aluizio Pessoa de Araújo）博士³的特別協助下，完成法學院的預科課程。⁴同年，我獲邀加入最近在伯南布哥州（Pernambuco）成立的工業社會服務協會（Industrial Social Service, SESI）。該協會是由全國工業總會（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deration）創設，並在總統的政令下成為合法社團。⁵

來邀請我參加的是我的一位好友，他也畢業於奧斯瓦多·克魯茲寄宿學校。直至今日，儘管我們的政治意見時常相左，但卻不影響我們深切的情誼。我們一定會有不同意見，這些不同意見傳達了我們對世界的不同看法，以及對生命的不同態度。我們也曾有過激烈不相讓的爭執，但是我們努力磨合弭平這些不愉快。因此在爭取自己的立場及維護這段情誼時，我們決定超越彼此的政治立場及意識形態。當時在不自知的情況下，我們已經以一種「後現代」的方式接納彼此。事實上，在這段尊重彼此的關係中，我們正真切地體驗著政治的基本原則。

我這位好友名叫 Paul Rangel Moreira，他現在已經是位很有名的律師，同時也是伯南布哥聯合大學（Federal University of Pernambuco）的法律系教授。⁶在一個晴朗的午後，他親訪我們位在海息飛（Recife）· Casa Forte 區 Rita de Souza 街二百二十四號的住處，他告訴我及我的第一任妻子艾爾莎（Elza）關於 SESI 這個機構以及這個機構可能對我們造成的影響。當時他已經接受該機構的主席、一位年輕工程師及企業家 Cid Sampaio 的邀請，去協調組織的社會服務計畫。而種種跡象顯示他將調往該機構的法律部門，完成他想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一展長才的夢想。

我和艾爾莎兩人帶著好奇及審慎評估的心態，靜默無語地聽著 Paulo Rangel 積極樂觀的說法。我和艾爾莎也對於他的說辭有點兒害怕，大概是害怕新事物，但是同時在我們內心，對這項冒險早已躍躍欲試。

夜晚降臨，夜幕已「降下」。在海息飛，夜晚總是突然來到。日光「令人驚喜地」仍掛在天邊，努力地照耀，彷彿時間已所剩不多。

艾爾莎啪地一聲把燈打開，問道：「保羅進這個機構要做什么？除了一份薪水外，這個機構還能提供什麼？保羅如何能在那裡滿足追求知識的渴望，那裡能提供有開創性的工作嗎？如果沒有這些，他會因為無法從事他最喜歡的教學志業而抑鬱而終的。」

那年是我們在法學院的最後一年，正值學期中。就在我接到邀請的同時，正好發生了一些對我的生人有重大影響的事。我在先前的訪談中已經提過這件事，也在書本和期刊的生平註記中寫

過。艾爾莎很滿意事情的進展正如她所預料的——在我們開始一起生活後，她就在期望這件事的發生。當時艾爾莎很開心，但卻不是會加上「我就說嘛」的那種志得意滿，只是一種恰到好處的愉快。

我帶著如同改正了所犯錯誤的那種興奮之情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我回到家，一打開門，艾爾莎就問我：「今天在辦公室一切還好嗎？」當別人問這種問題時總帶有惹人厭的官僚俗濫，然而艾爾莎的提問卻總帶著一種聰穎機智，不是僵化的固定模式，她的問題帶有濃濃的好奇心，以及預示著真正的追究。

我告訴她一件中止了我才剛展開的律師生涯的事。我真的需要把發生的事說出來，我必須把我對一位年輕牙醫師所說的話一字不漏地重複一次。他就坐在我全新的辦公室裡，坐在我面前，他很害羞、很緊張，有點害怕的樣子。他的雙手好像突然脫離了他的控制，從他的身體分離而有了自己的意識，但沒辦法「自主行動」，或讓動作配合上他所說的話（天曉得他是怎麼辦到的）——這位年輕牙醫師對我說的是我必須馬上告訴艾爾莎的事。就像我們以往分享彼此所有的事一樣，在那特別的時刻，我急著和艾爾莎分享這段談話。我需要分享那位牙醫師和我之間所說的、所表達及未表達出的、所聽聞的、所傾聽的每字、每句。我們在重述一件事時，不只是在重述那件事而已，而是再次體驗那些形成目前所說話語的活生生經驗，在重述的同時，那些被說出的事又再次地被說了一次。因此，重述、述說已經說出的事，意謂著再次聽到某人或自己已經說過的

事。

我告訴艾爾莎：「今天下午，就在幾分鐘前，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令人興奮的事」，「妳知道嗎？我不要當律師了。並不是我覺得法律一點也不特別或不迷人；法律只是生命最基本的需求，它是需要去做的事；正如同其他的基本生活需求一樣，法律必須建立在倫理道德、安穩的生活條件、嚴謹的生活態度以及尊重他人的基礎上。但是法律並不是我想要的東西。」然後我跟艾爾莎述說發生的事，我所經歷到的事、我說的和聽到的每個字，以及當我們不說話時，瀰漫在我和他之間那富含意義的沉默。我和艾爾莎談到這個我以債權人律師的身分請到我辦公室談談的年輕牙醫師，這個年輕人剛開了間診所（還沒完工），但是卻還未還清他的債務。

他說：「我犯了一個錯誤。我想我是太過樂觀了，我貸了超過我償還能力範圍的額度。但是依法我有權保留開業所需的器材。所以，呃，先生……你可以拿走我們餐廳的家俱、客廳的家俱……」然後，他怯怯地笑了，不帶一絲譏諷，挖苦地幽默結束他的句子：「……只是你不能帶走我十八個月大的小女兒。」

我默默聽著他說話，同時我也在思考。之後我對他說：「就你的債務問題看來，我想你和你太太、你的小女兒，還有你的餐廳和客廳將暫時得以保住。我必須等到下週和我的當事人碰面時才能告訴他我要放棄這個案子，而等到他再找到下一個像我這般窮困潦倒的律師，大概又得再花上一個星期左右。這樣一來，你就能有些喘息的空間，但這只能為你爭取到一點點時間。我要跟